

「把好事辦好」

—也談政府管治中的普遍原則與具體情境

閻 小 駿

回望 20 世紀人類對政治的認知，不難發現其間曾經歷一個由「具體」到「抽象」再到「新的具體」的過程。在世紀之初，比較政治學試圖借鑑人類學民族誌的方法，來理解和書寫世界各地具體而微的政治實踐。世紀中葉之後，隨着冷戰逐步深入，東西陣營又熱中於從五彩斑斕的歷史情境中，總結出各自認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，以展開理念對抗。到了世紀尾聲至 21 世紀初，蘇東劇變和美國「9.11 事件」的悲劇才警醒世人，這些很好的普遍概念——舉凡經濟發展、政治民主、公平正義、社會活力、文化包容又或行政效率——若不能與各民族國家的歷史、制度、文化乃至身分認同具體場景相結合，則不免仍是徒具虛文、流於形式，無法轉化為好的治理成效澤及民眾。

舉例而言，政治學對「發展」概念的理解，即開端於對先進工業化國家發展經驗的探究。第一代發展學者嘗試把英美國家的具體經驗，抽象化成一條名為「現代化」的普世道路並推而廣之。然而，20 世紀 60 年代展開的對後發國家理論的探索證明，在時序上率先發展和後續發展的國家及地區，往往須採用相異而非同一

的發展模式。通過對拉美國家的研究，學者們亦認為不同民族國家採用怎樣的發展模式，與他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「中心」（主要指西方）和「邊緣」（主要是亞非拉第三世界）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密不可分。

善於結合普遍原則具體情境方可良政善治

戰後日本及「亞洲四小龍」與西方經驗大相逕庭的經濟復興之路，揭示出發展路徑必須與具體國家或地區的結構特性相適應，方能產生效果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的經驗，進一步證明西方發展道路並不具普世性——「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」——原來，普遍原則的種子，唯有同各國各地區具體的經濟特徵、制度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土壤相結合，才能綻放出最美麗的花朵。

普遍原則如何在多樣的歷史場景中以不同形式得以表達，是21世紀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。政治的普遍原理在具體情境中轉化為實在的治理成效，必須通過政府管治才能實現。良政善治既是政府管治的目標，又是政治學的終極理想。與促進發展相類，只有善於在管治中把政治的普遍原則與當時、當地的具體情境有機結合起來，達至兩者間的最優平衡，方可實現良政善治。事實證明，普遍原則只能在具體場景中得以實現和彰顯；而失去了普遍原則的指導，具體情境中的管治活動只會變得漫無目的，以致遲滯失能、舛誤叢生。

巴西新都：完美規劃無法掩蓋實際問題

初次看到巴西的巴西利亞規劃圖的人，往往會為其強烈的秩序美學所震撼：整座城市被設計得形如飛鳥，在巴西高原的紅土地上徐徐展開兩翼；市內各功能區塊分割井然，街道寬闊、地面空曠、綠蔭環繞；建築採用嚴整的幾何形體，風格統一對稱。這是一座年輕的城市。在 1950 年代破土興建前，此地還是一片荒原。幾乎可以說，巴西利亞是從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教科書中，直接遷移到這片荒原上的。

然而，在這座巴西新首都投入使用後的 60 餘年間，其設計缺陷也逐漸突顯。標準化的佈局使城市乏味單調，過度形式化的設計導致生活充滿不便；城市的功能分區嚴格而分散，提高了通勤成本；大而無當的綠地與街道消滅了活躍的公共空間。為保持城市的形式美，當局不得不禁止新建住宅，結果大量移民和勞工聚集在周邊衛星城，宏偉的巴西利亞迅速被巨量貧民窟包圍。

規劃設計上教科書式的完美，無法掩蓋實際運作中的問題重重。理論推演可行，到了操作中卻與現實脫節。巴西利亞城市工程的失敗主因，正在於套用普遍原則時脫離了具體歷史、文化及制度情境，缺失了將好的原則與具體實際相融合、「把好事辦好」、知行合一的創造力。這正如 1941 年毛澤東在〈改造我們的學習〉一文中描繪那樣：「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。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，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。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，忘記

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。」言之諄諄，聞者足戒。

中華民族強調知行合一坐言起行

中華民族從來都是強調知行合一、坐言起行的民族。如果說認識普遍原則所具有的指引意義是「知」，那麼在具體情境中對普遍原則的應用與落實就是「行」；「知」與「行」並無二致。我國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先生曾說：「只說一個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說一個行，已自有知在」；「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」。在紛繁複雜的實際工作中，唯有秉持知行合一的心學正道，惟精惟一，方能既發揮普遍原則的指導作用，又兼顧具體情境的實際需要；既符合「全局」的方向，又富於「一域」的創造；既統籌「共性」的實現，又保護「特性」的彰顯。

毋須諱言，人類對「不可知」的恐懼，使我們總有強烈願望把複雜、渾沌、具體的社會生活條分縷析、嚴格歸類，再根據普遍原則的要求一一賦予其標準化處理程序。的確，與傳統社會的管理形式相較，由工業化衍生出來的現代行政制度有助提高管治效率；但是也正因如此，在現代工業社會，社會政治問題的具體性往往被消解，其情境特徵被無視，人的因素被弱化，按章辦事、墨守成規、陳陳相因，取代了對具體情境的分析、對鮮活現實的關注和理論聯繫實際的創造。這並非知行合一的態度。

中國的革命者和建設者從來都旗幟鮮明地反對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「本本主義」。在百年民族復興的歷程中，「實事求是」是貫穿始終的思想信條。早在紅軍時期，毛澤東主席就寫到，「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，一味盲目執行」是一種「形式主義態度」。習近平主席也鄭重告誡我們：「任何超越現實、超越階段而急於求成的傾向都要努力避免，任何落後於實際、無視深刻變化着的客觀事實而因循守舊、故步自封的觀念和做法都要堅決糾正。」把管治的普遍原則同現實的具體情境妥善結合，就要求政府在複雜多變的實際中保持開放、兼聽和獨立思考的態度，警惕模式化思維的衝動，注重施政的「在地性」、政策與社會環境之間的「交互性」，及管治本身所具有的「時空性」。

港府要統籌好「全局」意志與「一域」需求

香港是我國一個特別行政區，也是國際觀瞻所繫的世界級都市和重要金融節點城市。港事無小事。在「一國兩制」框架下實現良政善治，更要求在政府管治中運用高度智慧和創造力，結合香港社會狀況、經濟特點、民意民情和制度實際，統籌好「全局」的意志與「一域」的需求，平衡好原則的抽象與實踐的具體，把普遍原則與地方的實際情境很好結合起來，以富有創新性的勇氣、辦法和想像力，組織和落實好中央政令在港的貫徹實施，努力「把好事辦好」。

當前，香港管治工作中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穩控疫情。應該說，過去兩年，香港在國外同期病例持續高發的情況下實現了本土病例長時間「清零」，這是中央、特區和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，反映出香港居民的高度素質，體現了香港作為成熟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程度。目前，由於第五波疫情快速發展，在短時間內出現較大量感染個案，醫療和隔離資源相對緊張，社會上也一度浮現消極情緒。面對疫情防控的嚴峻局面，尤其需要我們上下一心、同舟共濟，在中央支持下動員一切可動員的力量和資源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大家一起把實事辦實、好事辦好，盡快穩控疫情，確保社會大局穩定。「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」，相信雨過天青之後的香港，一定會是大家心目中更加美麗的共同家園。

(載於明報 2022 年 2 月 28 日)